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

侯建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
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

献 给

陈翰笙先生及中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冀中农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



著 者：侯建新
责任编辑：陈 谌 杨 群
责任校对：吴 仁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缘号 电话 远缘缘远 邮编 缘缘缘缘

网址 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缘缘伊伊缘毫米 缘缘开
印 张：缘缘缘
字 数： 千字
版 次：缘缘年 缘月第 缘版 缘缘年 缘月第 缘次印刷

缘缘缘缘缘缘缘 原 定价：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旧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	2
一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4
二 陈翰笙：农村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7
三 国民政府和其他农村调查及成果	11
第二节 本课题的材料与研究方法	14
一 资料来源	14
二 研究方法	19
第二章 环境、人口和教育	21
第一节 环 境	21
一 生态环境	21
二 行政区划沿革及地理位置	24
三 重点研究的村庄	26
第二节 人口与教育	28
一 人口数量变动	28
二 人口素质：教育	32
三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40
第三章 土地与产权	62
第一节 生产规模和产权关系	62

一	农家田场规模	62
二	农村经济性质分析	65
第二节	土地产权转移的一般趋势	72
第三节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81
第四章	农业生产考察	90
第一节	农业生产条件与技术	90
一	耕地灌溉	90
二	农业工具	95
三	挽 力	98
四	施肥、选种等农业科技的引进	102
五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105
第二节	农业劳动生产率	115
一	粮食作物结构及其变化	115
二	中等农民家庭实际播种面积	117
三	农业劳动生产率	120
四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128
第五章	产业结构变化与雇工	134
第一节	生产领域的扩大（一）	134
一	棉花种植	134
二	养殖业	139
三	家庭织布业	142
第二节	生产领域的扩大（二）	148
一	工匠和小贩	148
二	食品加工作坊	153
三	苇编、猪鬃加工等手工业	159
四	乡村工副业分析	161

第三节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165
第四节 人口流动和雇工.....	173
一 人口流动.....	173
二 雇工及其收入.....	178
三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185
第六章 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	190
第一节 农民的吃、穿、住.....	190
一 饮 食.....	190
二 住房和穿衣.....	195
第二节 其他日常消费.....	201
第三节 灾荒年.....	207
第四节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212
第七章 市场和借贷.....	229
第一节 市场分布与密度.....	229
第二节 农民日常交易.....	233
一 劳动产品交易及商品率.....	233
二 农村市场分析.....	240
三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244
第三节 乡村借贷.....	249
一 普遍负债是乡村高利贷的沃土.....	249
二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259
第八章 农户收支核算：中国没有“约曼”似的 富裕农民群体.....	274
第一节 农户总收入及生产、赋役支出.....	274
一 农民一年创造多少价值，农、工副业各占多少.....	274

二 生产费用.....	277
三 农民实际负担.....	282
四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291
第二节 各类农户收支核算.....	296
一 一般农民家庭分析.....	296
二 上层农民家庭分析.....	302
三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306
第九章 余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误区.....	316
第一节 所有制问题.....	317
第二节 雇佣劳动地位问题.....	322
第三节 人口问题.....	325
后 记.....	337
参考文献.....	342

第一章 绪 论

1840年后，国门被强力打开。中国逐渐丧失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或被迫和主动、或直接和间接地置身于空前广阔的外部世界之中。以往，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老王朝，虽然不止一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与颠覆，可它最终都以悠久的儒家文明将其同化，并在一次次的民族融合中不断扩大疆域和影响。鸦片战争，却是第一次败在高于自己文明程度的异邦之手。这一段经历对于中国人来讲，相当复杂和痛苦，救亡与变革，独立与发展，战争与和平，中华大地饱经忧患与沧桑。

鸟瞰最普通、最基本的生产者群体，从短时段看，中国农村似乎并未被外部世界的政治风暴与喧嚣所警动，农民依旧在那里重复着世世代代都差不多的生产和生活；然而从长时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经济与社会条件尤其市场条件的变动，农民的经济生活依然艰辛可也逐渐注入未曾有过的新因素，发生着缓慢的静悄悄的变化。岁月流失不能淹没那一段时光留下的痕迹，反而愈久而弥新，那毕竟是“乡土中国”与近代西方交手后产生的第一回合冲击波。150年过去了，回眸中国农民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近代农村市场经济启动和演进之曲折历程，是一个平凡而不无裨益的话题。“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今天是昔日的延伸，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本书基本内容就是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后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相关情况的一个白描。

所谓“白描”，并无任何文学含义，是指笔者力求规避主观

的或其他的因素干涉，而将该时段某一地域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发生的尽可能接近原貌地呈献给读者。不敢许诺做出了什么，但真实是我追求的最重要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学术界勃发的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细密的研究手段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经久不衰。就研究领域而言，其探索的触角不独占据传统的经济史，还涉足非经济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不仅宏观的即一个国家或地区，还可能是微观的即一个区域、一个村庄甚至家庭及家计。本书属于后者。它主要以华北冀中 11 村颇为系统、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对 20 世纪上半叶尤其三四十年代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周期，做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包括他们的生产与消费，收入与交换，人口与土地，以及投入再生产的储蓄率等，从而反映这一时期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近代市场发展轨迹。笔者还置冀中 11 村个案分析于华北乃至全国的宏观视野中，并与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和农村在相应范围内做出比较，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广阔和丰富的思考空间。

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本书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所使用资料基本来自 20 世纪 30 年代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所以，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对陈翰笙的农村调查以及民国时期其他农村调查与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和评述，并对本课题所使用的材料与研究方法有所交待。

第一节 旧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尤其是 1925～1935 年的 10 年间，中国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兴起了一股对农村经济社会颇为关注的热潮。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

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群。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试验”或“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 and 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甚至外国学者。当时的农村所以引起了那么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国农村经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弱势群体，在当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格外突出且日形严重，“救济农村”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口号。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忧虑而进行实地考察，或为推行某种主张而进行尝试性的乡村改造；二是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基本保持传统风貌又饱受“新经济”折磨的中国农村，成为中外学者理想的研究标本；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后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颇具规模的农民家庭调查，本书主要受惠于这次农村调查成果。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情调查和统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作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一些外国人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满铁”的调查，则有明显的政治背景。

显然，风行于 30 年代的农村调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论。总的看，国人这一时期那么关注农村，主要还是因世界市场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冲击引发的。当时中国正逐渐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的波动，尤其资本主义世界在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空前的经济危机，势必影响中国市场，脆弱的农村经济自然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经济冲击在中国系首次出现。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中，小农

经济往往周期性陷入破产的深渊，一般都伴随着封建王朝政治腐败和恶性土地兼并，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国传统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自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律，并不罕见，不过因域外经济危机而引发大规模的农村经济凋敝，则是史无前例的。国人根据各自的背景和角度得出不同的理解和结论，亦不足为奇。无论如何，关于这些理解所演绎的不同活动及其调查记载，颇有历史价值，客观上或为旧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改造做出探索与尝试，或为日后农村经济与社会研究留下宝贵资料，在此值得进行较系统回顾与分析^①。

一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后，在河北省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省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策划和进行的。这些人认为，中国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文化建设。这支队伍的成分以及他们的具体主张，五光十色，颇为复杂，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和操作方案。不过，包括梁漱溟在内，

① 钱俊瑞同志 1981 年口述写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 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大约有如下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张农村已资本主义化的托派，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普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2 辑，第 18～24 页，中国展望出版社，北京，1987。

乡村建设运动派都多少带有一些农村乌托邦思想。

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平民教育。1926年选定河北省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与他的同事们举家迁至该地。在定县的10年间，针对他们认为是农民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开展四大教育，这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对于农民，“须与农村生活切近处，意识所及处，教导引发”，“从一村一乡小范围作起，培养建筑，使与大社会发生联系，造成共同意识”^①。为更有效地进行上述教育，他们同时进行农村调查和统计工作。作为这些调查和统计工作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文献资料保留下来，所以这部分工作大概更具有长远意义。调查部主任是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手下经常有一二十人，还培训了一部分当地人做调查员。调查工作原计划一年完成，由于当地农民的不信任、不合作以及工作人员不得力等原因，结果调查进行了7年。他们先对全县情况进行概况调查，然后开展分村调查，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比较完备。主要成果是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1933年出版，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定县调查成果，除一部分出版外，更多的资料还未及整理，以原始状态保留下来，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资料散失^②。

① 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大公报》1934年10月9日。

② 李景汉：《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第11期。关于对定县实验的评论见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1934年8月），编入《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7；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0。

如果说晏阳初从事“识字救国”，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像“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①。梁漱溟在解释他自己的“乡治”运动时说：“一切努力于乡村改进事业，或解决农民问题的，都可以宽泛的称之为‘乡村运动’或‘农民运动’；类如乡村自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农民合作运动、农佃减租运动等皆是。我们的‘乡治’或‘村治’主张，则是有特殊意义，是整个建国计划一部分的乡村运动。”^②梁漱溟这里所说的特殊意义，便是指文化上的意义。乡村建设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3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思想发动和培训人员。先后共培训两届学生400余人，分赴山东省内27个县，试办乡农学校77处。按照梁漱溟的理论，这些乡农学校从教育入手对学员进行训诲。这里所谓的教育，其基本内容就是发扬固有的礼教精华，培训内在能力，并将自治工作与教育打成一片，将自治机构融合在教育机构之中。换句话说，是通过教育而形成的习惯，代替法律；以柔性的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二阶段1933～1937年，在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实现县、乡、村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改进。邹平的最高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实行的办法是行政部门教育机关化，也就是说，由于强调教育因此很独特地以学校的形式建立起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用“村学”代替“村公所”，所谓县自治机关系统便是“县政府—乡学—村学”系统。在“政教富卫”这个模式中，除“政”、“教”外，还有“富”的方面，这就是组织各类合作社，尤其重视运销合作社，并从事农产优良品种的推广。所谓“卫”，即指训练农民，组织民团，实行自卫。

① 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第3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第257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北京，1932。

七七事变后，山东省首脑也是梁漱溟乡治运动的赞助人韩复榘，拒绝梁氏关于守土抗战的劝告，而且利用乡农学校抓壮丁，抢民款，不战而逃，甚是丑恶，乡建派因此而声名狼藉，为人诟病。至此，梁漱溟惨淡经营 7 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寿终正寝。可悲的是，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所进行的文化复兴与政权建设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保留下来的实证性资料也颇为有限。像诸如村学乡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以礼代法”等社会治理方略，统统成为道德主义的空想。在这个运动中，大概只有发展经济和引进农业科学技术这方面略有成效，如小规模的技术推广、市场组织改进等，而这些本是梁先生最不在意的^①。

二 陈翰笙：农村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它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判定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针对过分夸大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偏见，陈翰笙早在 20 年代就抱定决心，对中国农村进行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反映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造^②。

^① 详见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第 321、343 页。

^② 晚年的陈翰笙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特别提到了那次农村调查的起因：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围绕失败的原因，产生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是年 4 月，李大钊被捕并被处以绞刑，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陈翰笙处境十分危险，于是转道日本奔赴苏联。陈翰笙及夫人被安排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与该所东方部部长马扎亚尔因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马扎亚尔 1926 年到过中国，“马扎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

1929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聘请，陈翰笙主持该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确定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作为三个重点，以便尽可能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

1929年7~9月，陈翰笙组织了45人调查团。首先进入无锡农村，调查了55个村落和8个农村市场，其中对22个村1207户村民进行逐户调查。共制定40多种表格，获得2000多个数据。调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事先设计，即预先编制调查表装订成册（每册20多页），一户一册，相当于为每一个调查对象都建立一份相应的档案；第二步逐户进行实地调查和记录；第三步是事后进行分析。这三个步骤，每一户都由同一个人自始至终进行主持。以后的调查，特别是保定农村调查，基本都按此方式进行。

1930年5~8月，陈翰笙组织了另一个更大规模的68人调查团，进入保定地区即清苑县农村。在4个月时间里重点调查了11个村庄2119户农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同时，陈翰笙还组织了另一批调查团奔赴营口、大连、长春、齐

① 接上页注释② 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我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扎亚尔不以为然地说，资本就是资本，还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呀？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扎亚尔。莫斯科的争论虽无结论，但促使陈翰笙下了决心：如有机会，一定对中国农村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见该书第37~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齐哈尔等地，考察流亡到东北的难民状况。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侧面研究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与社会。

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组织了广东农村调查。由于宋庆龄的帮助，工作进展顺利。调查范围包括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历时三个半月；而后又在番禺的10个典型村调查了1209户。同时还进行了50个县335个村的通讯调查。1933年，陈翰笙领队调查安徽、河南、山东烟草种植地区，目的在于研究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农生活。此外，陈翰笙还组织了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和杭嘉湖20个县近百村的调查等。

从1928年至1934年共6年时间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团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地追求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先进的调查方法，训练有素的调查队伍，加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调查成果相当丰厚。依靠这批资料，陈翰笙用中英文撰写的大量论著以及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的经济论文，对国内外理论界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值得一提的是，陈翰笙是中共地下党秘密党员，而这次调查是在国民党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杨杏佛的资助和保护下利用合法机构和身份进行的。结果，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专业理论研究队伍，如当年来自无锡的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和孙冶方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以这次农村调查为基础，还发展起中国关于农村和农民研究的马克思

① 如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上海，1932；《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1937；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研究》，《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23期，中华书局，1933；薛暮桥：《贫困现象的基本原因》，《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